

第一章 古代近东的再发现

从基督教诞生的时候起，近东尤其是圣经地区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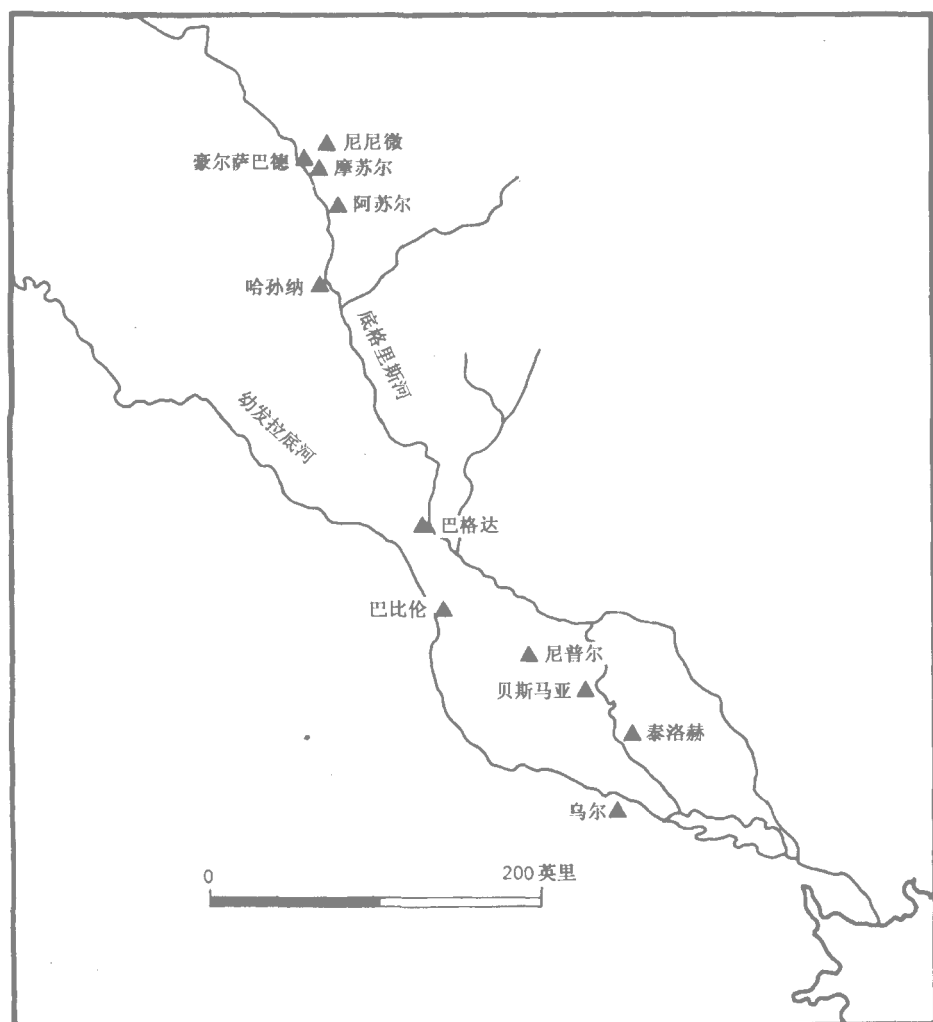
自十字军最后一次东征之后，英国与近东及中东的联系就日益稀少了，仅有个别船只仍旧定期往来于欧洲与圣地之间；而有关圣经地区的信息则更为稀少了，有关它们的故事越加不可信了。由一位从未离开过自家炉边的冒险精神倡导者写成的、有众多版本的《约翰·曼德威尔爵士旅行记》，多年来一直是范本著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而代之。直到 19 世纪，当英国同奥斯曼各省建立起直接的政治联系时，好奇者才又得以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进行较为自由的旅行。1827 年，J.S. 白金汗曾著文声称，他是一个世纪以来出版在这些国家旅行记的第一人，而且他发现在旅行时身着阿拉伯人服装和扮作穆斯林乃是明智之举，因为旅行中充斥着很多实实在在的危险。这些危险来自人和动物，就如同奥斯顿·亨利·拉亚德甚至在 50 年后也采用穆斯林服饰和习惯旅行时所遇到的那样。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但在 19 世纪间蓄积起能量的旅行热潮还是由于对《旧约全书》之地的极大兴趣及寻找前往印度商业黄金国的最短线路这种更为实际的需求而爆发了。大多身为名学者的外交和军事人员，在对亚述和苏美尔——亚伯拉罕开始流浪前的家园——兴趣的不断升温之中作出了贡献。

由这种兴趣引发的许多活动都集中在巴格达的英国管辖区，而且是在 1808 年克劳德斯·里奇被任命为第一任英国驻扎官之后。虽然土耳其管理机构反复无常，但作为复杂的外交交易相互妥协的一部分，却也时常允许具有冒险精神的欧洲人去探索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重要土丘。19 世纪中叶，反映这些人进取精神的第一批辉煌成果开始在伦敦和巴黎露面。这些人无疑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们是合法的掠夺者，但他们同时也确实抢救出一些华美的实物。虽然伊拉克尚未要求归还尼尼微出土的亚述浮雕，但这样的请求，对于大英博物馆来说，可能会产生类似于因希腊请求归还阿尔金大理石制品而引起的问题。

所有的国家都着手划定自己的考古领地。德国人将阿苏尔和巴比伦作为自己的领地；博塔领导下的法国人则占据了豪尔萨巴德；拉亚德领导下的英国人则占据了尼尼微（见地图 1）。为了保证未来发掘所必需的资金，首要的任务仍然是为博物馆搜集精美的实物。不过，到 19 世纪末，探索方法已更为科学，记录水平也提高了。在探寻未经烧制的泥砖墙的技术方面，德国人走在了前面。在这之前，发掘者不会辨认这种墙。而且，德国人通过训练谢尔盖村的民工使用这些技术，建立起了一种沿用至最近十年的传统和“限制严格的行业”。

在这一地区的南部，早期的探索极少产生惊人的发现，而且由于主要建筑材料是易碎的和难以把握的未经烧制的泥砖，故而情况就更为糟糕。不过，从 19 世纪中期起，苏美尔的一些重要的典型遗址还是招来了络绎不绝的探险者：1853 年，英国驻扎官泰勒开始在乌尔遗址发掘；1877 年，法国驻巴士拉的副领事德·萨尔泽克则开始在泰洛赫遗址发掘；而欲占领这一地区的第一支美国探



地图 1 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探险图

险队也因 1889 年在尼普尔遗址的灾难性的第一期发掘而到达这里。在那儿，他们的营地遭到了仇视他们的部族的攻击，并被焚为平地。厄运伴随着美国人早期的几次发掘。对此，下面有关拜恩克斯去乌尔遗址探险的一段引文就充满了 19 世纪的味道。

筹集探险资金的工作完全依赖于我本人。当我成功地获得了其中有一半是由洛克菲勒先生担保的 6000 美元资金时，探险（队）最好的朋友毛顿主席又答应提供 6000 美元，从而使资金总数达到了 12000 美元。这一钱数是完成第一年工作所必需的。随后，我购买了各种发掘装备，包括我认为在沙漠中用得上的各种东西，并用船将它们运到布斯伦赫。

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最令人愉快的回忆之一就是由普瑞森特·毛顿为其探险队的朋友们所设的巴比伦晚宴。我们餐具上的卡片是用尼布甲尼撒语写成的；面包是巴比伦砖的形状；冰淇淋主盘是沙漠颜色，其上的甜冰骆驼载负着另外一些甜冰；另有一只巴别塔形的大蛋糕，在其周围徜徉着头戴微型尖状物的小型阿拉伯人，而裹在其台阶里的是每位客人的艺术珍宝。作为探险队长，我当场开始发掘。从大蛋糕的废墟中，我抢救并得到了其里面的珍宝——刚刚在提范尼发现的古物。最后，主人提议为探险队干杯，但非常不巧的是，我的餐具上没有一个杯子。想想当客人们举杯祝愿我成功而我却无以应对的狼狈相，它预示着失败吗？我决无成功乃是天意吗？

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这种发掘势头增强了，伊拉克便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措施。在杰特拉德·贝尔的提议和帮助下，伊拉克颁布了第一部古物法。这部法律规

定，所有考古探索必须经过批准；所有外国探险队的人员配备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孤品禁止出国，而且所有其他的发现物要在协商的基础上由发掘者和伊拉克国立博物馆两者共享。伊拉克国立博物馆于 1926 年开馆，杰特拉德·贝尔曾担任第一任馆长。她也是 1932 年（当时她已去世）在伊拉克创建的英国考古学院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本世纪的许多重要发掘都是同该学院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982 年，在伦敦的一个特别的亚述厅举行了学院的 50 周年庆典。当时，古物法又有了变化，任何古物禁止出口。国立博物馆已经壮大并繁荣起来。此时有了一个重要的政府部门负责所有有关国家遗产方面的事务，其中包括抢救性发掘、长期性的重点研究工作以及纪念物的保管与修复工作。这些措施获得了成功。这一点通过来自伊拉克的新信息的比率就可判断出来，而且它使得我们必须经常性地修改许多观点，并意味着教科书也需要经常加以修改。这些新信息通常只能从专业杂志——有时是非英语的专业杂志——上获得，这样，在吸收这些新信息方面就出现了实际的困难。

发掘者和田野工作也面临着新的问题。突出的问题就是组织田野探险队开支的剧增。以往，一支庞大的探险队雇工多至数百人。现在，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历史珍奇。即使能够找到可以符合现代要求的足够熟练的管理人员，如此规模庞大的探险队在财政上也难以给予考虑。目前，除了那些抢救性发掘外，绝大多数发掘倾向于利用一支规模较小的队伍集中解决专门而明确的问题。这种队伍是由摄影师、保管员、建筑师及遗址负责人这样的专家组成。当大量资料更多地利用计算机进行处理的时候，科学家如古生物学家通常就可以介入田野工作和取样，并进行发掘后的分析。在能够获得与传统农业和手

工业生产方法有关的资料的地方，民族学研究者就会通过他们对这些材料的研究而提供有价值的成果。

强调解决专门问题也就意味着人们将更加依赖于调查技巧，因为调查技巧可以事先确定解决这个特定问题的最为理想的地点。糟糕的是，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在中东地区通常无法使用对于调查工作来说极其有用的航空摄影技术。不过，卫星照片现在也成了一种有趣的资料来源，这些照片中有的一些甚至能够显示出地表下较薄的软土层或沙层中的遗迹。尽管存在着政治上的以及实际的困难，但是，许多工作还是完成了。R.M. 亚当斯及其同伴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调查工作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他们改进了地表搜集和解释的技巧。所以，尽管其在方法上仍存在着公认的局限性，但现在却有可能绘制出从最早时代至各个历史时期的聚落分布图及规模图。根据调查工作，至少也可能会对人口波动作出相对的估计，即使绝对人口数量仍很难或甚至无法估测。他们的调查工作也使亚当斯得以在重现史前时代美索不达米亚某些自然特征，尤其是主要河流的移动过程和阿拉伯湾口位置的争论方面，进行有价值的尝试。一些主要河道的走向是有迹可循的，遗址群就是通过这些河道而联系起来的。这样，借助它们，有时就能够确定古代的政治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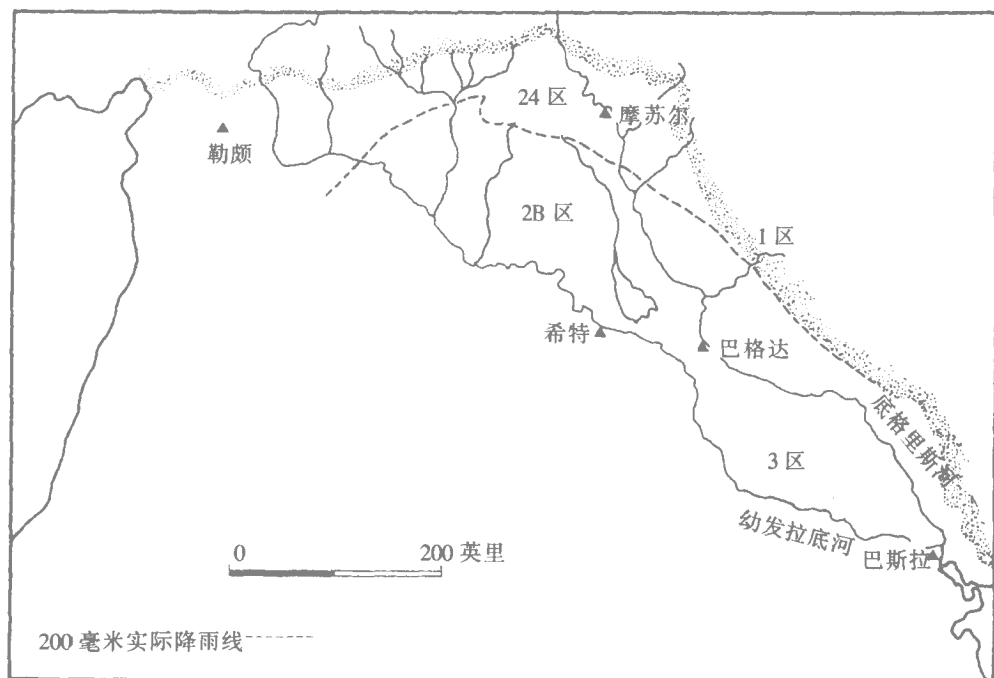
自然环境

不全面了解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特征，显然是无法研究那里的考古。可惜的是，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自然状况在各个方面都与数千年以前是一样的。我们的证据并非总是丰富得足以允许我们重现过去的状况。譬如，在自美索不达米亚最早有人定居以来的9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肯定发生过气候波动。但是这

种气候波动却并非时常都能轻而易举地探明。不过，在专家当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一致的看法：在自然地貌和气候形态方面，那里不曾发生过剧烈的或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人类本身通常会随着环境的恶化而变更自身的环境。森林砍伐和过度放牧都曾影响了降雨量。在边缘地区，即使是小的降雨量波动都会在经济上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灌溉曾使这一地区的许多地方成为定居之地。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灌溉又使得大片土地在今天因盐碱化而变得暂时无法耕种。

尽管存在着这些变化，但我们现在确实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重现本书重点关注的这个地区最早的定居者所处的环境。

这一地区有时被称作大美索不达米亚，但决不是一个单位。其范围包括现代叙利亚和伊朗的部分地区及整个伊拉克。从气候和地理上看，它大体可分作三大区（见地图 2）。在三大区中，最北端的一个区包括现代伊拉克东北部的陶鲁斯与札格罗斯山麓。在该区发现了最早的定居证据，这里有隐蔽性的山谷，山谷中有丰富的水源、牧草、猎物、水果、坚果及野生谷物。在很多方面，这里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和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定居的理想地点。不过，这里的冬天是严酷的，而且谷地之间或隔山之间的交流也很困难。尽管土壤并不肥沃，但有限的谷物种植还是可以进行的。这里还有丰富的石头和木材，以及独特的资源贮藏如东北部的铜及沥青。另有各种颜料、方铅矿、孔雀石和赭石。第二个大区覆盖了陶鲁斯山麓以南、希特—萨玛腊一线以北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高原以及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平原。前一个地区大体相当于古罗马的杰兹拉“岛”行省，而这一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它包括了杰贝尔辛贾尔地区，并且被 200 毫米降雨线



地图 2 大美索不达
米亚的气候/生态区

分成两个不等的部分。在此降雨线以北,过去被认为可以从事旱作农业。目前,这条降雨线位于杰贝尔辛贾尔地区的南部。不过,在史前时代,这条降雨线的实际位置肯定是变动的。而在跨越了第 6 千纪大部分时间的哈孙纳文化时期,杰贝尔辛贾尔以南那个地区的稠密定居则暗示了,这条降雨线有时会延伸至其现在位置以南极远的地方。在这一地区,旱作农业是没有保障的。奥茨夫妇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 300 毫米降雨线乃是旱作农业更为可靠的分界线,那可能暗示了这就是我们应看到的分界线,它位于现代杰贝尔更北的地区。不论精确的分界线在什么位置,很清楚,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地理区至少有一半地

区需要依靠灌溉方才有可能进行农业生产。

这一地区有多种自然资源，但却远不及山麓地区丰富。肥沃的冲积区的面积有限，但通过灌溉，产量可能也会很高。而且这里也有相对丰富的牧草，有石头，还有一些木材。在杰兹拉地区，则有野驴群。在河流两岸茂密的灌木丛中有野猪和一些食肉动物。除了希特的沥青和塔尔塔尔河道凹地的硫磺矿外，该地区就再没有别的矿产。硫磺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并且可以用于制皮。从很早时候起，硫磺就被用作颜料。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杰兹拉地区早期的聚落形态与南部聚落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的聚落形态通常是由其间点缀着小型交易市镇分散村落组成。

在第二大区中，最肥沃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河与札格罗斯山脉之间，并构成了亚述帝国的心脏地带。它是一个富饶的谷物种植区。在那里，土地无须灌溉就能获得高产。而且，在平原上，散布着亚述时期的城市遗址。其中一些遗址从最早的史前时期起就有人居住。不过较早的地层埋藏很深，除非通过深度发掘的手段，否则是很难被揭露的。马洛温在尼尼微的发掘就是此类发掘的典型代表。大小扎布河将平原等分为二，并加强了其同东部的联系。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大约公元前 1200 年以前的遗物通常表现出一种个性，这种个性暗示了其于北部及东部、苏美尔及阿卡得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有一条重要路线就是从这一平原的东北角出发，经腊万迪兹谷地上至伊朗高原。从新石器时代起，这可能就是一条重要的交流干线。

在小扎布河以南，杰贝尔哈姆伦地区的对角线方向正好介于底格里斯河和山区之间，呈西北／东南走向，限定了哈姆伦平原的西界。最近对该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调

查和取样，这项工作是在当地一座水库大坝建成之前完成的。这座水库的建造可能会淹没该谷地的大多数地区。这些工作证明了边远地区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农业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其作为连结伊朗西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亚述里亚的各主要中心的纽带方面。哈姆伦谷地的南端大体上以迪亚拉谷地为界。迪亚拉谷地是另一条通向伊朗高原的路线。在更晚的时期，这里成了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即著名的豪拉撒路。

第三个区是由两河之间平坦的冲积平原构成的。它包括平原南部的古代苏美尔王国和北部的阿卡得王国。据说，这里是伊甸园旧址。今天看到它时，很难理解这块时常遭受酷热、洪水、风暴的毫无特色的荒地为什么曾被视为富足而舒适的处女地。然而，尽管其确实荒凉，但土壤却是极为肥沃的，能够生产出大量的剩余农产品，这种剩余强化了其文明的基础。苏美尔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作为汤因比的“刺激与反应”理论或较少学究气的“需要是创造之母”理论的典型例证。在社会系统发展的复杂程度尚不足以让群体间进行合作的环境中，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聚落的。人群间的合作能够使他们通过灌溉农业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这种剩余又能让他们进行贸易和开发生存所必需的特殊技能。如果这一地区曾经更为宜人，设想苏美尔文明或许不会这么早地发达起来，并非没有一点意义。

在南部平原，我们有更好的证据可以证明，在自平原最早的永久性定居以来的六七千年间，环境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河道的变化。航空调查和地面调查均表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在今巴格达附近曾一度合二为一。而后，一些河流进入冲积带。亚当斯认

为,这可能就是第 5 千纪或第 6 千纪早期平原上最初定居时的状况。渐渐地,一些小河流干枯了。同时,现在幼发拉底河的前身则取道冲积带的中部,而底格里斯河则向东慢慢地进入它现在的河床。根据古代遗址(如尼普尔遗址这样的古老的宗教城市)逐渐被放弃,我们实际上可以追溯幼发拉底河向西的移动。两条河流在冲积带的南端又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沙特阿拉伯河,蜿蜒流出曾被威尔弗雷德·泰希格生动地描述过的大芦苇区,而后进入阿拉伯湾。阿拉伯湾口早期的位置是一个仍需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本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其位于现在位置的以北更远处,而淤泥冲积逐渐将其向南推进。后来,里斯与法尔康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假设。他们认为,由于海湾地表构造运动抵消了淤泥堆积,所以,海岸线实际上变化甚微。十年后,这一结论遭到抨击。今天,人们日益感到,第 3 千纪文献所描述的古乌尔城和拉伽什城位于海边或许是可信的。海湾西海岸发现的欧贝德时期的证据也暗示了当时海岸线可能要比现在的海岸线高得多。这一结论或许支持了那种认为当时海湾顶端位于更北的地方的论点。

无论两大河流波动的具体细节如何,它们都造成了平原上土壤的肥沃。直至最近,两河仍易发生严重的洪水。数千年间,洪水的泛滥在这一地区堆积了一层厚厚的肥沃的淤泥。在厚达 5 米的堆积下面,发现了第 5 千纪的遗址。不过,风蚀是相当严重的。按照亚当斯的观点,风蚀现在已经使第 3 和第 4 千纪的地层暴露出来。一般来讲,风蚀并不是历时性的直进的加剧过程。这一结论对于解释地面调查所获得的遗物有着直接的意义。整个冲积平原处在旱作农业区以外:年降雨量低至 150 毫米。雨水集中于冬季各月份,而夏季则酷热。另外还有最早耕作者的

问题。河水泛滥恰值作物生长最旺盛的春季，除非采取措施遏制洪水，否则，它就会冲走幼小的作物。如果这种灾难不曾发生，那么，随后就必须按照合适的周期将水引入田地，促进作物成熟。否则，它们就会枯萎而死。这些问题能够被解决的话，就可以成功地种植谷物、水果、蔬菜和饲料作物等多种作物。

由于灌溉技术必不可少，所以，早期聚落一般均集中在沿着河道的相当狭窄的地带。聚落有时是由三四个城镇（town）紧密地集合而成，有时则是一座大城市（city）如乌鲁克城，统领着一串更小的卫星城镇和村落。在考古学上，村落（village）通常得不到充分的体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在淤积区或风蚀区内很难发现其遗迹，部分则是由于过去的考古学家喜欢在有望发现更多材料的遗址上进行工作。这样，实际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歪曲了。在有人居住的小块土地之间是半沙漠化的、无法灌溉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可以放牧山羊和绵羊，可以收集能用作燃料的灌木和荆棘丛。除了农业方面的潜力外，苏美尔平原没有任何天然的石头或金属资源。距其最近的石头产地位于埃利都遗址西边的荒漠之中。而最近的铜供应则远至伊朗、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半岛。该地区在第4千纪晚期的某个时候引进了棕榈之后，才有了用作屋顶及其他用途的质地相当差的木材来源，但木材的获得仍很不容易。其他所有木材肯定是来自北部和东部山区，在寺庙建筑中很常用的香柏可能来自黎巴嫩。所有木材或许还是经海湾进口而来的，可能是来自遥远的印度。鱼可以随意地从河里及南部大沼泽中捕捞，可以熏制、干制，也可鲜吃。在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河生软体动物的壳，以及鱼和动物骨头。这些东西既提供了用于镶嵌和装饰的青贝，又提供了食物。河岸上繁茂的植物又为各种

猎物提供了藏身之处，在苏美尔社会显然不存在食猪的禁忌。平原南部的沼泽地富产鱼和芦苇。居民的传统生活似乎自苏美尔时代起就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建筑与船只第 3 千纪的艺术中相映成趣。平原南部的最早居民的体质特征类似于现代居民，不过在乌尔遗址皇家墓地发现的头骨上的牙齿通常很大。从头骨材料来看，没有任何人种混杂的迹象，也没有任何标本可以证明以往根据艺术方面的证据而提出的短颅苏美尔人和长颅闪米特人各半的观点。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苏美尔所发现的头骨材料通常保存不佳，所以不可能进行准确的测量。阿瑟尔·凯思爵士在报告乌尔遗址皇家墓地所出人骨遗存时，特别提到他能够测量的所有头骨均呈现出大、长、窄的特征，并且脑容量大。

牧人与农人

尽管在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无法区分不同的体质类型，但在其人口中毫无疑问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两类人，即定居的村民和流动的牧人。他们之间的区分并非总是泾渭分明。原因是，有些村民可能也是季节性迁移的。譬如，在夏季，他们就带着畜群进山寻觅更好的牧场。同时，根据文献记载，在第 2 千纪早期，一些游牧民族也已在像马里和西巴尔这样的大城镇的边缘建立了永久性营地。不过，从本质上讲，整个人口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生活在永久性聚落中，需要依靠农业和为了自身生存而饲养牲畜的人群；一是赶着绵羊和山羊群在聚落间流动的人群。两种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是互补的。牧人通过向定居的农人提供商品和服务，换取自己很少生产的谷物。虽然存在着这种共生的经济关系，但在群体间也会产生冲突。市镇居民通常将游牧民鄙视为粗鲁的野蛮人。然而，这些人在

灌溉区边缘地带的出现，将会在整个第 3 千纪对定居人口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牧人群体的最富有和最贫穷的成员中，存在着走向永久性定居的自然趋向。产生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拥有最大羊群的人会因报酬递减法则而蒙受损失，他们便将收益更多地投入其他方面，通常是投向不动产。同时，群体中的赤贫成员则被迫去城镇寻找工作。在第 3 千纪城镇的档案中，早先主要是苏美尔人的姓名。后来在这些档案中，闪米特人的姓名——通常是那些游牧者的姓名——则稳定增长。这种情况恰好暗示了人口向市镇的流动。在这些移民者中，有一些人可能源于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平原北部讲闪米特语的城镇和村落，而不是源于游牧部落。在我们掌握的最早的一些泥板上发现了单个的闪米特名字。到早王朝时期，阿布萨拉比赫遗址一些用苏美尔语写作的抄写员也有闪米特名字。这反映了在这些城镇最早的定居者中讲苏美尔语的人数量有限。随着时间的流逝，语言上的平衡似乎已威胁到他们。到了大约公元前 2000 年，人们几乎就不再讲苏美尔语了。而到了大约公元前 1800 年，苏美尔语便成了一种死语。广而言之，我们还可以假设，当时市镇人口是由以闪米特语作为母语的人组成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是来自苏美尔腹地边缘上的牧人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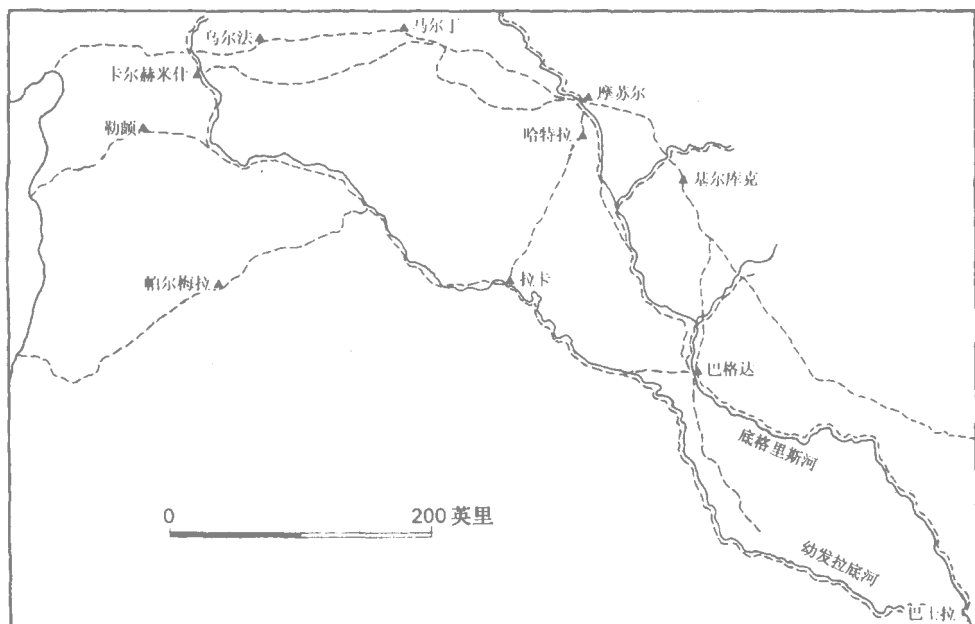
在考古上确认游牧人群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物质财产的零散性以及他们的许多人工制品、毛毯、皮包及诸如此类的物品的易毁性。有关这种游牧人群考古学证据的缺乏，使得人们直到相对较近的时期仍低估了其在史前时代的作用。或许，他们曾经不仅在运送原料而且在传播观念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石器时代，尤其如此。他们赶着自己的畜群到新牧场的规律性往复

移动，使得他们与生活在不同生态区域中的不同人群发生了联系。同时，可能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交流渠道。这种交流渠道不仅使产品和观念得以互流，而且也将广大区域中的孤立人群联结起来。后来，随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及文字的发展，这种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市镇里的专家、商人、抄写员和使者之类的人所取代了。

交 流

我们已经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可以分作三个地理区域，但这些区域在任何程度上都无法构成自足的单元。在经济和自然方面，它们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一些主要路线（见地图 3）将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连为一体。在这些路线中，最北面的一条路线从地中海的东

地图 3 文中所述近东地区的路线图



北角出发，经过土耳其，与现代边界线平行向前到达马尔丁。在那里，与从一个重要铜产地出发北至埃尔伽尼麦顿附近的一条路线交汇，而后折向东南。然后，越过边界线，从重要的布拉克遗址附近经过，再穿过杰贝尔辛贾尔的空白地带，向东直指底格里斯河和古代的尼尼微城（即现代的摩苏尔）。其中许多路线至今仍有迹可寻，而且为现代的公路甚至是铁路所沿用。

在这条路线稍南一点，另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从卡尔赫米什出发，基本上是直接向东到达辛贾尔及底格里斯河。虽然底格里斯河危险，但在一年的特定季节，可以经由这条河从尼尼微向南航行；而在另一些时候，则可选择另一条陆路，即经由基尔库克穿越哈姆伦谷地南行。更南面的是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从地中海出发，经由阿勒颇，在拉卡附近抵达幼发拉底河，然后这条路线沿河南行远至法拉伽，之后，折而向东。如果旅行者横穿哈特拉附近的塔尔塔尔河，则可能会更为便捷。虽然这样做在地理上更为困难，但却可以避开当地居民。这些当地人由于曾向沿河谷旅行的商队征收高额过路费而臭名远扬。在这条路线南面且与之平行的是另一条经由帕尔梅拉的路线，不过，我们不清楚这条路线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被广泛使用的。从阿曼出发穿越沙漠的那条路线直至骆驼交通出现后才被使用，在本书中，与我们无关。

从北部到南部的旅行则更为方便。原因是，河流尤其是幼发拉底河在各个时期都是一条至关重要的联系纽带。虽然大量的货物通常用木排沿着底格里斯河运输，甚至远达巴格达，但它却是一条更加变化无常的河流。如前所述，穿越杰贝尔哈姆伦谷地的那条陆路也是一条可供选择的路线。从前，在平原南部，主要水道也是交流的良好渠道。从文献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大宗谷物和其他商品

是通过驳船来运输的。就大宗货物的运输而言，水运比陆运更为容易。众神灵在其神圣的巡幸之中也是乘船去拜见在其他苏美尔城市里的同伴。最后，还有两条非常重要的路线是从平原南端出发向南通向海湾口。这样，就可以通往海外及富庶的马根、梅卢哈及迪尔蒙。或许在这些路线中，更为重要的是经由水路来往于沙塔尔阿拉伯之间的路线，从第 3 千纪的文献中我们了解到，在包括可能位于冲积带北端的阿卡得在内的平原上的一些重要城市的码头停着海外的船只，而且其进入码头可能要经由沙塔尔。另有一条陆路是从两大河的交汇处出发，沿海湾西海岸向南延伸。虽然这是一条季节性路线，但是，在较晚一些时期，这条路线经常为游牧人群所用。或许，这条路线自第 4 千纪末期起就已经在使用，运输的是某些数量相对较小的物品。

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所看到的乃是一个能够生产大量剩余农产品的地区。它与盛产其所缺乏的基本原料尤其是金属的地区存在着良好的联系。贸易是经济的原动力，也是该地区市镇生活以及古老文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